



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孙静

老马识途

□高德群

老马开会,常说“我讲三句话。”我想,那会议该快结束了。然后这三句话,常常就变成一两个小时的抻面,软乎乎一锅,那时候的会议室没有空调,坐的是很硬的凳子,那样的会议,让当时刚参加工作的我开始怀疑人生。

老马的话,不是普通话,不是启东话,甚至也不是他老家通州方言。而是三合一,你能听懂部分,还有部分要靠猜。但是好在他讲话慢,有时见你一脸懵逼,他有耐心再重复一遍。

说起耐心,如果说老马是天下第二,那没人敢说是天下第一,这一点,我多次领教过。比如早读迟到,你一定会看见站在教室门口耐心等你来的老马。他见你来,也不批评,拍拍你肩膀,就慢腾腾走开了,留下你慢慢体会。

老马老,满脸重叠的褶子,走路时一只手总端着,身体微侧。他办公桌上有张十多年前的照片,他对我说,那时候年轻。可我心里觉得那时候也不比现在显年轻。他的衣服,恕我不敬,都挺老式的。总是一双布鞋。胡子是每天刮的,但没见过几次刮得干净的。出去办事,都是骑一辆老式的二八自行车。后面跟着瞿秘书,也是一辆二八自行车,很旧的那种。连当年学校口号也是老气横秋的,叫“定叫今年胜去年”。我敢打赌,没有哪个稍微大一点的学校有这么土气的口号。

他的搭档也都很老。袁亚副校长,教务处吴永东、陆松筠、叶裕美,政教处的杜锦忠,总务处的两个,在当时的我眼中,都老,连大部分老师都很老。但奇怪的事就是,学校的成绩就是好,好得几乎没有质疑。

瞿秘书是最显老的一个,他很瘦,是那种皮包骨的精瘦,烟瘾大,几乎一支撑着一支。上海松江人,说话间总蹦出上海方言。写字框架大,别人一行能写20个字,他老先生只能写10来个字。字如其人,他虽来自烟雨江南,从事的是谨慎的秘书工作,但他性格中极粗犷的一面。我也多次验证这一揣测:老马大多数情况下会比他的秘书早到办公室,然后帮他扫一地的烟蒂。但你往往不能简单地看穿一个人的生命。瞿秘书也有少为人知的另一面。我曾偶见他在办公楼下的音乐教室,神情轻扬的弹奏《九九艳阳天》,运指如飞,阳光照进来,他的身影和钢琴盖叠成一条美妙的弧线,一曲弹罢,见我在一边,便得意地咧嘴而笑,露出满嘴的黑牙。

岁月流金

现在回想起来,那批老同志很多当得起多才多艺这四字。陆松筠是南大中文系的,写一手好字,一手好文章,常常一边写字,一边自我欣赏半天;杜锦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,工作极细致,他居然能把毛衣打得比女同志还漂亮。

我刚刚进校工作的时候,正遇上纪念毛泽东主席一百周年诞辰,学校搞歌咏比赛,每个教研组都拿节目,领头的都是那批老教师,他们的音调和动作都中规中矩,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在那一刻,他们变得活泼而富有朝气,流动的气韵周旋在他们身上。那时候我们的工资还很低,但即使如此,我们的心灵丰满,充满激情和勃然生长的心态。

但是我几乎从没有见过老马露过什么绝活或者才艺,他每天很早起来,很晚回家,一直在校园里转悠,很少讲话,从不发火。

有次他端了个凳子,来听我课。我没有看见他,还是随便上,里面读错了几个字音,自己也没在意。下课了,才看到他慢悠悠端着凳子走出教室。我追过去,说:“马校长,你提提意见。”他没回头,鼻音很重地回:“蛮好。”就走了。

回到办公室,和同事们说起此事,他们说,你得去老马办公室听他意见。我就去了。他难得一见地在抽烟,见我进去,让我坐下,把那个字写出来,我马上反应过来我当时错了,尴尬地呆着。他又说了遍“蛮好的”,就把烟掐了,看着我说:“备课,蛮费工夫的,得慢慢来。”我说知道了,他拍拍我肩膀,呵呵笑了。

我还听说有个老师为了工作调动,和老马吵架,唾沫飞溅到他脸上,他慢慢抹去,一声不吭。最后还是那个老师流了泪,道了歉。

我还知道老马有点惧内,在家里几乎没有大声,对两个女儿宠到无以复加。有时我感觉我们年轻教师也就是被他宠着的人,当时怨着他,觉得他烦琐;现在却怀念着他,后悔那时“真是太聪明了”。

老马叫马锡清,是我的老校长。

一个好校长,也许真的不需要太多才华,不需要太多手段,只要如他,给人以信任和厚实感,如暖阳,明亮而不刺眼,柔软却有力量。平时不觉其光辉,回想时,却倍感温暖。

有作家给文化下过一个定义:“根植于内心的修养,无需提醒的自觉,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,为他人着想的善良。”老马就是这样,带给校园以爱和善良,让教师们自由而自觉地成长。

一次改变我命运的家访

□常青波

1954年7月,我接到海安胡集初中新生录取通知书,真是又喜又忧。

喜的是我一个文盲家族的穷小子,是瓦甸小学唯一被录取的应届生,也是墩头乡墩北村新中国第一个中学生。忧的是面对天灾人祸我能否完成这份学业。6月,连降特大暴雨,河满溢田,田河不分,一片汪洋。稻禾全都葬身水底,低洼的里下河乡露出它可怕的一面。那时我父亲去世不久,寡母领着我和三个小妹本就举步维艰,遇上洪灾更是雪上加霜。

妈妈卖掉几箩筐麦子,凑足了费用,让我准时报到。入学后我被分在一班,遇上了班主任孟庆云恩师,获得学费减免和二等助学金,每月七元的伙食费只要交三元八角。

光阴荏苒,三个学期过去了。1956年春节后,妈妈再也拿不出钱供我上学了。一年半内,她卖掉方桌、木桶、衣箱,坛坛罐罐,凡是有人要的都变卖了。剩下五个人一张床,家徒四壁,食不果腹。妈妈东讨西借,太难了,开学的日子过了,期中考试都过了,我也不提上学的事了。

一天上午我在埋头看书。“常青波!”一个亲切而熟悉的

声音,我慌忙站起身,条件反射叫了声:“孟老师!”泪水模糊了双眼,木讷地跟在恩师身边。记得他双手搭在背后,环顾了一番,缓步走向土灶,揭开锅盖,一锅冰冷无物,另一锅锈迹斑斑。他又转身走向唯一的容器:笆斗大小的陶罐,弯腰伸手探摸,空无粒粮。“你妈妈呢?”恩师问。“带着我妹去草荒地挖百合了。”我回答。恩师深深叹了口气,温柔地对我说:“学习不能半途而废,没有知识将来会更加困难。你的学习成绩很好,没钱也要上学校来,我们想办法帮助解决。”语重心长的话语,让我重新回到了学校,助学金提高到每月四元八角,也没叫我补交书本费、住宿费。后来知道这两项费用是不可少的,我意识到一定是我帮了我交上了。

我家距胡中约40华里,步行一趟需3个小时。恩师走访我家用的什么交通工具?是怎么过的独木桥?中午又在哪里歇脚吃饭?已成千古之谜。

1957年夏我考进如皋师范,离开了受教近三年的恩师。毕业后我以恩师为榜样,工作40年,敬业爱生。改革开放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,被提干。我两个儿子分别是中国的高级工程师、美国的高级设计师。三个孙辈也已成长读书、就业。

饮水思源,没有恩师64年前的那次走访,我一个“可教育好子女”铁定一辈子耕田耙地。恩师一直在我心中。上世纪70年代,我开始四处打听恩师的信息,得到的噩耗让我如雷劈顶:恩师已于1968年含冤离世。无处报恩,内疚、自责、百感交集,经常失眠。退休后我决心寻找恩师的后代。十多年来一无所获。直到去年秋,应我所托的大公镇教育办公室周祥主任电告我两条信息:恩师是东台市人,有个儿子在海安农行系统工作过。今年4月我终于联系上了已退休5年的孟希汉同志。

5月7日,我和儿子来到了东台市富安镇孟庄村九组恩师的故居,实现了与恩师五双儿女的聚会。面对恩师遗像,献上万元礼包,默哀致礼,那银光闪亮的眼镜,那和蔼慈祥的音容,让我回到恩师膝下受教的日子,我潸然泪下。我来迟了,迟了半个世纪又两年。

在恩师长子希文兄弟带领下,来到一片桑园,桑树葱绿,翠柏挺拔,树冠下是恩师、师母的墓地。面对墓碑我双膝跪地,合掌叩首,祷告恩师:学生看您来了!您的一次家访改变了我家几代人的命运!如果有来世望您还要收我做学生。

玉兰一瓣

大西洋爱人

□沈安琪

如果此生没有看过大西洋的落日。

你有没有遇见过那种女人。你大概会在暑气散去的夏日里,夜幕快降临的某个街角遇上她,十六七岁,瘦瘦薄薄的样子,穿着深绿色短裙子,吃着棒棒糖,踮着脚蹦蹦地走在路边。

她应该会系一个小铃铛在脖子上做项链,手上也戴着金色的小手链。她像是在等什么人,又像只是下了学回家。她

走过你,你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新开的玫瑰的香味,你能看到她V型领口下面有一点点细密密的汗。

你或许刚好看到她抬起手,金色的细链子顺着少女的手腕滑到小臂上卡住了。她也许还会和你眨眨眼,你看见她卷翘的睫毛在冲你甜甜地笑。

那个时候你是懵的,她是你几十年生命中遇见过的最好的女子,她够美,够年轻,她是你日日夜夜里所有幻想摁成一个幻想的

集合。当人震惊于美时,往往是放空和沉默。可当人开始有了非分之想,想摇她的铃铛、想给她买糖,她却已经走远了。这便是大西洋的落日,一抹年轻性感高级的光影。她让你觉得人活这一瞬间便罢,却又私心想日日夜夜都占有她。她不属于某一片天空,亦不属于某一片云。她只是悄悄地摇动一下你的心,然后悄悄地跑开。追逐她是徒劳的,不过你倒可以拥有那完完整整的、一瞬间的爱恋。

心窗片羽

羊肉蘸酱

□吴渝

听他说我们九圩港有对老夫妻在路边搭了小瓦屋,卖刚出锅的白水羊肉。日子久了,我放弃了红烧,炖汤,保留了白切蘸酱的吃法。羊肉蘸酱逐渐成了冬天里我们一个最美念想。

有一次去九圩港买了羊肉回来,我上班的时间快到了,来不及进厨房切,他直接把车子开到我公司楼下,我撕了几片羊肉蘸酱,拿在手里就上楼了。晚上进门就看到桌上,亲爱的羊肉尖尖地堆在盘子里。然而,酱却找不到,怎么也找不到。我去卧室问他,说扔掉了,酱不好。我连忙跑到垃圾桶里翻找。那里除了一堆菜叶、头发,无它。

这顿羊肉吃得索然无味。不得已,我扔到锅里红烧了。

过了几天,他回上海前照例去九圩港买羊肉,四块带走,一块留给我。我没有特意吩咐他带酱。我想,这次肯定有。

结果大出意料。

我很气恼,但还是决定吃完羊肉再赌气。几片下肚,感觉实在是暴殄天物。我拿出钱包,去超市买了三种酱,却没有一种符合要求。

星期天很快到了,太阳久久凝视着窗台,直到十点半我

还躺在床上。我听见门轻微地响了一下。有人轻轻进来,接着是包放下来的声音。我想,才走了四天,肯定不是他,女儿上学去了,妈妈前天刚刚来过,会是谁啊。我决定躺在床上不出声,然后猛然吓唬一下这“陌生人”。过了一会儿,房门开了一条缝。一只脑袋探头探脑地一晃而过。我猛地掀开被子:“你怎么回来了?回来干什么?”

他调皮地把包朝橱里塞:“懒虫怎么还不起来。”

“起来有什么好处?又没有好吃的。”他说有粽子,包着肉。我表示不感兴趣。

“我们去买羊肉。”话音刚落,我就一个打挺,坐起来了。

杀羊的地方好远啊。过了一个又一个绿灯,超市和人群稀少到看不到。快天黑时,我们才抵达公路下面一个破旧的小屋,如果不是几匹雪白的羊挂在钩子上,你一定以为这是个临时修轮胎的草棚子。没有窗子,没有门。系一块布帘子起着门的作用。

老板娘亲热地示意我到铺盖上坐坐。

她从食橱里取出两只羊脖子。他让她先切一块,老板娘切了十来片时,我便悄悄从案角上捏了一块,企图放到嘴里。他轻

轻敲了下我手背:“等称好了,再吃。”我疑惑地看着他的脸,老板娘开心地笑着说:“你吃,你吃,吃一块不打紧。”橱里还有两只肥嘟嘟的羊腿儿温顺地跪在盘子里,我已经收回视线,在转回去时又瞟了它们一眼,就听见他说:“把这羊腿儿也一起称了吧。”老板娘高兴地端出羊腿儿,又把仅剩的两只羊舌头加进去:“这个也一起称给你吧,不算两种价钱了。”

他问老板娘:“你们天天吃羊肉,真幸福啊。”

老板娘摇摇头:“吃不起哪。”

我向周围睃了一周,屋子里除了羊肉,地上有一堆刚削的红薯皮。我迟疑了一下,问:“怎么没有酱的?”老板怔了怔,连忙说:“有的呀!”他从桌子下面抱出一个很小的塑料罐。罐口积了许多丰腴的油垢。我最爱吃的酱竟然装在这么脏的容器里,是令我意外的。想拒绝,可大勺子开始舀了,勺子的根部乌七八黑的,积攒着经年累月的酱的硬壳……

我恐惧地向老板表示一点点就足够了。可老板不依不饶,非要舀了鼓鼓一袋子。

捏着酱出来,他劝我赶紧吃羊肉蘸酱,我坚决地摇了摇头,表示并不是非蘸酱不可。